

历史  
新  
视野

# 中华文明探源

张碧波  
张军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K203/116

2007

历史新视野

# 中华文明探源

张碧波  
张军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明探源/张碧波,张军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历史新视野书系)

ISBN 978-7-208-07423-1

I. 中... II. ①张...②张... III. 文化史—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50349号

书系策划 李伟国

责任编辑 曹勇庆

封面设计 张志全

美术编辑 杨德鸿

· 历史新视野书系 ·

**中华文明探源**

张碧波 张军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5.5 插页 2 字数 244,000

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50

ISBN 978-7-208-07423-1/K·1384

定价 26.00元

## 序

傅道彬

已经 78 岁高龄的张碧波教授，却不断有新的学术著作问世。去年 5 月的时候张先生送给我他刚刚出版的《中华早期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考察》，巨著煌煌，竟有三十五万余言。匆匆读过，深为先生纵横捭阖的议论和材料引证的宏富所吸引。而这本书刚刚读过，10 月的时候，张先生又送来了《中华文明探源》的书稿，不等阅读，已为张先生的用力之勤著书之快而称奇了。张先生不会打字，不用电脑，书稿都是一笔一笔手写的。而他晚年有手颤之疾，由于手颤抖得厉害，每写一字，都必须站立。看到张先生连写自己的名字都特别吃力，再想想张先生颤抖中书写的几十万字的文稿，就不禁为之动容，心里一阵阵发热。

文明史的研究是一个艰难的课题。文明(Civilization)一词的拉丁文词根是 Civilis，指在某个特定的范围安顿下来的居民。而在文明的学术研究中，就不像语词研究那样简单有序，而存在着众说纷纭的不同理解。英国文化史学家泰勒(Edward B. Tylor)1871 年在其代表作《原始文化》中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这是关于“文化”一词的经典定义，但是这里也包含了一个经典的学术论争，即文明与文化概念的区分问题。泰勒显然是把文化与文明作了相同的理解，但是这样的见解却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中把文化理解成动态的正在发生变化的历史存在，而把文明理解成已经形成的历史存在，因此他的结论是“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归宿。”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文明与文化的理解刚好相反。《周易·贲·彖》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是人文的精华，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渗透融化到

广泛的人类社会和精神世界的各个方面,就是文化。人类一切发亮的闪光的东西都是属于文明的,所以《礼记·乐记》谓:“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而文明融入社会的深层结构融入人类生活的精神深处就是文化,这刚好与斯宾格勒的观点相反,文明是活跃的是流动的,而文化却是一个不断凝聚而成的历史形式是文明不断演化的历史过程。我个人更倾向于《易传》的解释,如果正面阐释尚有歧义的话,考察一个词的反义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文明一词的反义词是蒙昧与野蛮,文化正是在与愚昧和蒙昧的斗争中实现和完成的,这恰好证明了文化的历史性特征。

张先生显然是循着文明——文化的路径描述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历史过程。古典早期文明的历史是漫长而纷纭的,清晰而完整地描述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与文明是相当困难的。由于资料的匮乏,也由于学术视野的狭隘,上古时代的中国文明只留下了苍茫而模糊的背影。张先生却知难而上,力图在陶器、玉器等文明的考察中完成对上古时代的三皇、黄帝、颛顼王国、唐尧王国以及南方少数民族的三苗王国的勾勒和描述。虽然这样的描述仍然是粗线条的,但是在许多问题上有了突破,对未来中国文明史的研究有借鉴和启示意义。作者的努力得益于考古材料的大量运用,可以看出王国维倡导的“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的影响。例如作者通过对陶寺遗址的考古材料的考察中,分析了陶寺遗址中“朱书‘文’字扁壶”的文化意义,由此论述尧都的存在及文化意义,进而论证了华夏族的产生和文化的发源。我曾到过位于山西省临汾附近的陶寺村,那是一个给人许多思想联想的地方,却没有想到如此深刻的学术问题。

社会上有一种偏见,以为人到老年便趋于保守,但这对于张碧波先生绝对是个例外。上世纪80年代初张先生就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提出过许多富有开拓意义的观点,而至晚年张先生依然保持了学术上旺盛的创造精神,这大概就是张先生虽至晚年却不断有学术成果问世的原因。在古典文明的研究中有“历史阶段三段论”(即石器——青铜器——铁器)的著名观点,而张先生从中国文明的实际出发大胆地提出了中华文明史上的“玉器时代”,这一观点的提出对我们理解中国原始文明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中华文明的形成上,作者坚持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文明起源多样性的理论观点,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一条线,一个系统,一个流域,而是满天星斗,四面开花。这样的学术观点跳出了“中原文化中心”的窠臼,不仅使作者的著作中新见迭出多有创获,也必将对后来的研究者以多方面的启发。这使我

们相信,创新与否,保守与否,都是与年龄无关的。

初与张先生结识时,正值先生壮年。张先生与人交往,不虚与,少客套,说话直来直去,任性自然。那时我与张先生住得很近,张先生家的楼前有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柳树,我便称张先生谓“独柳先生”。黄昏时候,常与张先生于柳树下海阔天空,谈天说地,深得悬谈之乐。而如今先生年届耄耋,却风采依然,精神上绝无一丝老态。只是张先生后来搬了家,住得远了,谈话的机会少了。而先生门前的柳树依然茂盛,生机盎然,每当从柳树下走过,还常常想起那些海阔天空的黄昏,想起风采照人的“独柳先生”。

2007年1月30日于哈尔滨

## 前 言

研究中华文明起源问题,首先碰到的是文明理论问题。中国史学界、文明史学界现今尚没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尚未形成有中国特色(即符合中华文明史实际的)文明史观,其次碰到的是史料问题,其一是考古文化学资料,由于考古学的局限,考古学家很少能够对考古资料的文化属性、文化功能及其在文明发生学的作用以及从整体面貌上判断其族属等问题作出判断,更少有明确的判断;其二为文献史料,中国是一古文献大国,但涉及上古史、文明发生学史,则多被归之于传说、神话;虽有《史记·五帝本纪》和后出的《史记·三皇本纪》,却多不认其为信史,多取怀疑态度,从而使中华上古史尚不能构成体系,尚存在诸多争论。而考古学与历史学(包含史料学)还缺少整合研究,而或有所整合,但缺少力度,缺少深度和广度。

上述种种,给中华文明史,尤其文明发生学史的研究带来诸多困难,也带来诸多挑战。中华文明史是五千年、抑是八千年,上万年?至今尚在研究,尚在争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面对这个问题,深感遗憾,也深感汗颜。

中华文明是怎么产生的?何时产生的?在哪个地区产生的?是华夏一条线,还是满天星斗,四面开花?中华文明产生的道路、特征及其对中华历史、中华文明史的影响,中华文明发展体系以及中华文化传统的形成等诸多问题均应在文明探源中有所回答,有所涉及。这应是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上争取回答(或有所回答)的课题。这是我动手写这本小册子的初衷。

研究中华文明发生阶段的问题首先面对的是如何对待“历史阶段三段论”(石器——青铜器——铁器,世界各地各国历史均经历这三个阶段)和“文明三要素论”(城市、文字、金属冶炼)这两种由西方传入而为中国学界广泛使用的理论。我并不排斥西方理论,西方理论可以给我们以启发,甚至可以给我们以指导。在这本小书

的写作中,我就学习运用了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早熟的儿童”的理论,结合中华历史的实际,用以认识中华文明产生的早熟性特征与文明王国的早期性特征。

其次是对文献史料的使用问题:一是史料互证,二是史料辨析,三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的整合研究。尤其运用整合研究帮助我发现了很多新问题,受益匪浅。

中华文明产生的道路、特征、时代,是需首先关注的问题。在本书的第一章与第二章提出中华上古史有一个玉器时代、有一个玉器和彩陶时代,这又正是所谓的新石器时代,也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时代。玉器与彩陶横跨 5 000—6 000 年之久,玉器与彩陶是沟通天地的礼器、神器、法器;沟通天地的大权掌握在少数人(王者兼巫者)手中,掌握了玉器与彩陶就掌握了神权,掌握了神权就掌握了政治权力、人间社会权力,王权就来于神权。玉器与彩陶是中华古史精神文明载体的最本质最独特的文化内涵,是文明起源的独特的标志物。连类而及,我们重点探讨了“王权与神权”,“巫觋·王者·文化人”等中华文明的理论观念。玉器、彩陶是沟通天地神鬼的礼器、神器、法器;是神权、宗教权的象征物,标志物;掌握玉器、彩陶,独占玉器、彩陶,就独占了神权;掌握了神权就掌握了政治权和人间社会权、社会财富垄断权,就掌握了王权。王权来于神权,其社会政治系统(结构)与社会文化系统(结构)正依赖于天神所赐予的权力而存在、而运转,王者权威得到宗教意义上的证明,因独占玉器、彩陶而得以独占通天神权的国王就成了自然神力与社会权力的统一体,王权产生了,社会进入了文明阶段。掌握玉器、彩陶以沟通天地的人是巫觋,而巫觋为古代之智者、圣者,为通天阶级,巫觋中之极少数转化为王者,即王巫结合,王者为大巫,为宗教主,其权力来于神权,即王权神授;巫觋集团之大部为王者之师、国师、王者之辅弼,即为中华第一代文化人,为王朝的开辟者、国家的建设者、王国文明的创建者,与各诸帝王共同创建了中华早期文明史。玉器、彩陶——神权——王权——巫觋——王巫结合——文化人,这就是我们勾画的中华文明发生学史、文明起源的理论观念的框架。它既可揭示中华文明起源的独特道路,又可揭示中华文明的独特特质。第一、二、三、四章正是概括地阐释了这个文明起源的理论观念框架;并据此具体探索新石器时代各区域文化,各王国文明产生诸问题。

探索文明的产生所坚持的三条原则:



### 1. 坚持考古与历史整合研究原则

考古学与史学及人文科学的整合、互补,是解决文明起源诸多难题、疑点的最有效的方法(论);尤其因为考古文化多不能认定此区域文化或文化遗址的文化属性,整合研究可以帮助解决此一难题、疑点。如对大汶口、红山、良渚等区域文化的文化属性、文明王国的判定,正是得益于考古与历史整合研究。

### 2. 承认并使用古代思想家、史学家,对古代史整合成果的研究原则

中华古代学者有一个对前代历史(包括思想文化)不断地进行判断、总结和整合的文化传统,对所谓“神话时代”、“传说时代”,就已经在不断地进行着整合工作。从现有的文献史料史看,春秋、战国、秦汉均有对上古历史文化系统的大整合,历史大转折时期、学术发达时期、国家一统时期均有大综合、大系统的整合工作。“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从传说中,从神话中看到“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徐旭生先生的论断给我们以启示。

西汉的大一统为历史文化的大综合、大系统的整合准备了条件,才有出于巫史世家的司马迁和《史记·五帝本纪》的大整合,才有司马氏笔下的黄帝谱系。到司马贞时期又有了一次大系统的整合,才有五帝之上的三皇谱系。这给我们提供了考古与历史整合的条件。中华文明史正是在这不断地大整合中得到充实、丰富与提高。

### 3. 坚持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的观点,作为文明探源的一个重要原则

中华大地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完整的地理单元,这一东亚地理单元,东西落差形成三级巨大的阶梯,南北跨度达30个纬度,这既决定了中华文化起源的本土性,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在关联性,又形成了中华大地的极其不同的多种生态环境,构筑了似断实连的多种不同的人文发展机遇和文化区域,从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诸特征。因此,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一条线,一个系统,一个流域,而是满天星斗、四面开花。中华文明应起源于新石器时代。黄河上游,甘陕地区,渭水流域孕育了三皇文化,创建了三皇文明王国,是为中华文明史的开端,距今8000年以前是否有早于三皇文明王国,尚需(尚可)研究。黄河下游出有大

汶口王国；辽河流域，出有红山王国；黄河中游出有裴李岗——磁山王国，此即五帝之首的黄帝文明王国；黄河中游襄汾陶寺文化，此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唐尧、虞舜文明王国；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出有良渚文化与良渚文明王国；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出有三苗王国。这说明，中华文明不仅有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黄河流域上游为三皇文明，下游为大汶口太昊、少昊、颛顼文明）；尚有辽河流域的颛顼、高辛王国文明；尚有长江流域的良渚九黎王国文明、三苗王国文明。而考古学与文献学现尚不能认证的文明和文明王国更不知凡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王国融合了，消亡了；而尧舜以降华夏中心观的形成与加强，由于之前的黄炎及黄帝、蚩尤之争的结果，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之大扫荡、大冲击、大融合，山东大汶口颛顼王国文明、辽西红山颛顼、高辛王国文明受到强烈冲击，红山龙与仰韶玫瑰花会合，“鳞纹彩陶罐‘之’字纹筒形罐与玫瑰花彩陶盆共生，证明红山诸文化与仰韶文化在这里（按指河北蔚县西合营）会合了。”“同样证明源于关中的仰韶文化与其北方文化（按指燕山以北的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文化）之间通道存在的长期性。”<sup>①</sup>这说明古代文化交流与融合是不断在进行着，而不同区域文化之碰撞、交流与融合又构成历史前进的动力，推进历史文化由多元走向一元，更由于华夏中心观的出现，华夏王国之推行五服制、九州制，即推行中原王朝中心观念，加速了历史文化之由多元向一元转化，多元与一元的辩证统一发展逐步构成了中华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观念与体系，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华历史的格局与发展方向。中原华夏王朝（中心）之外的所谓“南蛮”、“西戎”、“东夷”、“北狄”则在各种政策推动下，成为华夏王朝之“四裔”，并被视为“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视为“非我族类”，形成了“华夷之防”的历史文化对立观念。当然这些都是中华文明进入成熟阶段出现的历史文化现象。

我们正是根据上述三原则，在坚持所提出的中华文明产生的理论观念中，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作了相关的探索。

中华文明史上有没有一个三皇王国？中华文明是否以三皇王国为开编？这应是文明探源工程首先回答的问题。

唐人司马贞从对历史文化与历史文献的大整合中，建立了中华历史三皇文化：伏羲、女娲、炎帝神农帝系，这应是在司马谈父子的五帝帝系之上的又一对中华历

① 苏秉琦：《关于编写田野考古发掘报告问题》，载《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1期。

史文化的伟大开拓与建树,将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数千年,正面建构了从新石器时代(距今10 000—8 000年)开端的中华文明史。

伏羲王国文明起源于甘肃地区,对黄河流域、山东东夷族团、长江流域苗蛮族团之文化发展均给予重大影响。

从神话到历史到女王,是《三皇本纪·女娲本纪》留给我们的历史记录。女娲王国之女王,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明王国女王的历史存在,揭出从母系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型过渡时遗留下的文化痕迹,这又正揭出中华文明产生的早熟性与初期国家早期性诸特征。西王母的历史文化、红山文化中的女神像等均可以从女娲王国之女王的历史文化中得到启示。

神农炎帝开创了以农业开端的中华文明史,虽然在黄炎之争中,黄帝以战争取得胜利,但农业文明为黄帝王国所继承,并因之构成为中华历史文化的主流文明形态。中华文化传统主要指华夏——汉文化传统均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与发展。

距今7 000多年黄帝及其族团开创了黄帝王国文明,是为中华历史五帝时代开端。这时期中华文明之产生表现为多元性、多区域性、多族团性诸特点。研究黄帝王国文明,重点在黄帝族团之跨入文明门槛的道路、黄帝文明的模式。“三战然后得其志”,黄帝族团先后与炎帝神农王国、蚩尤王国发生战争。经过多次反复战斗,以黄帝为首的游牧民族族团战胜已成“衰世”的炎帝政权,夺得天下,建立王国。后又与蚩尤集团发生大冲突,经“九战”,战胜了蚩尤集团。“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华文明之产生,应该说有两条道路,一是王权源于神权,一是王权源于军权。掌握军权,掌握战争权,就获得了王权,获得政治权、宗教权。“暴力是一切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产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动力,成为古代中国政权更迭的常式,是从黄帝开始的。在炎帝王国、蚩尤王国的较高的经济文化基础之上,黄帝王国文明得到快速发展,将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新高峰。继炎帝之后,为中华民族以农立国确定了历史文化发展方向,这应是炎黄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

“黄帝之时以玉为兵”是汉晋时袁康在《越绝书》中提出来的古史四个演进阶段中的一个:“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作铁兵”——以生产工具武器质地的变化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总和,并与政治历史相结合,用以确定和划分社会发展历史时代以及王朝更迭的历史文化观完全符合中华历史、中华文化史、中华文明史的历史实际。“以玉为兵”、“夫玉亦神物也”,第一次提出中华古史上有一个“以玉

为兵”的时代,第一次提出“玉为神物”的文化观念。玉戈、玉钺、玉斧、玉戚是武器、是权威的象征,玉之为神物、礼器、法器,是沟通天地鬼神的神物,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以玉器沟通天地,人天合一,这就是“以玉为兵”、“玉为神物”的文化内涵,则“以玉为兵”则指从黄帝开始,中华古史上有一个玉器时代,玉器作为神物,作为精神文明载体,文明的标志物,表现出中华文明的独特特质。玉兵为神物,具有一种神秘光环,掌控玉兵、玉器的人也具有了神秘性与权威性。因之而被视为神,具有神格,成为“王权神授”观念的渊藪。

对大汶口区域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由哪些族团先后创造的文化形态,以及何时进入文明阶段的问题,由太昊少昊颛顼族团,由酋邦而发展进入颛顼文明王国,根据对大汶口三种习俗——人工改变颅型、拔掉侧门齿和口含石、陶珠的体质人类学考察,认定其为颛顼族团的文化标志物。对“绝地天通”的考析,指出这一重大宗教改革——独占通天神权,由神权独占而获得王权、管理社会的政治权和社会财富垄断权。这是中华文明产生另一重要途径,区别于依靠军权、战争权而获得王权的黄帝王国文明途径。大汶口颛顼王国文明史证明,颛顼与黄帝没有谱系关系,不存在血缘关系。

红山文化已跨入文明门槛,已建立红山王国,这在学界似已取得共识。但红山文化与红山王国是哪一或哪些族团的创造?红山区域是新石器时代制玉与制陶(彩陶)中心,玉器与彩陶在文明起源上的文化功能是红山王国文明探源一个大问题。以考古与历史整合研究视角确认红山文化、红山文明王国是由颛顼族团(由山东大汶口地区北上辽西)、高辛族团共同创造的,提出红山文化与颛顼、高辛王国命题。考察了颛顼之为女性,为女王,牛河梁的“女神庙”应为女王神殿,是红山人对创造红山王国的先祖先王的尊崇与享祭。红山王国女王的出现是中华文明早熟性与王国早期性的一个特点。玉器与彩陶是精神文明的载体,红山人建立起精神生产体系,创造了一个玉器与彩陶时代。

从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视角,考察黄河流域文明或谓华夏文明之外的长江流域文明是文明探源工作必需列为重点的一个问题思考。首先考察良渚文化的族属,确认其为祝融九黎族团被迫南迁长江创建良渚文化与良渚王国;重点考察其政治、文化体系及其以王国为核心的诸国林立的精神生产体系。玉琮是良渚人的独特创造(按红山文化的彩陶筒形罐为陶琮),玉琮是天地宇宙的象征物,其兽面纹为

王徽,是良渚人的精神文明的载体。

考察唐尧王国、虞舜王国,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游地区文明的产生、文明王国诸特征问题:从部落联盟基础上转型为文明王国、华夏观念的确立、王位继承与“禅让”等。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中游建立的三苗王国是本文最后一个考察对象。三苗王国是尧舜禹王位禅让斗争过程中出现的,唐尧太子丹朱、唐尧王国司徒讙兜及其族团被迫南迁,融入三苗族团建立三苗王国。南迁江汉地区的三苗后发展为南蛮荆楚文化;另一支西迁,与羌族融合,促进了西羌文化的发展。“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将反对尧舜禅位者迫害放逐于四方边裔;从此构成了华夏与四裔,天下与四海的以华夏——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中国政治体系,决定性的影响着中华历史的格局,影响着中华历史的进程。

文字的出现应是文明探源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学界一般认为文字的出现是文明的一项重要因素。中华文明发生学史所显示的是文字与玉器与彩陶三者俱为沟通天地的礼器、神器、法器。

渭水流域和陕甘地区的老官台、甘肃秦安的前仰韶文化,黄河上游的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黄河中游的裴李岗、磁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松泽文化、良渚文化,淮河流域安徽蚌埠双墩村新石器文化等,都有陶器符号与龟甲符号伴出。

陶器符号的陶器为彩陶,“而且一器只刻一个记号,陶符重复出现的频率较高,相同或相似的符号归并后可达 50 多种。”<sup>①</sup>“也有极个别的器物在相同或相近的部分或在腹部、底部分别绘出两个符号”。<sup>②</sup>

这些陶符是文字、抑是文字的前身?是所谓“花押”、“族徽”、“物勒工名”?还是……

“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sup>③</sup>是知人类创造文字,把人类意识物态化、符号化,通过主观意识影响客观存在,这是人类文明一大创造,这是惊天地,泣

① 王志俊:《关于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王蕴智:《史前陶器符号的发现与汉字起源的探索》,载《华夏考古》1994年第3期。

② 《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页。

③ 《淮南子·本经训》。

鬼神的精神文明的大创造。新石器时代的诸多陶器符号,是刻画在彩陶上的,良渚文化上的符号则刻在玉器上的,玉器、彩陶均为沟通天地的神器、礼器,而附着在这两种器身上的刻画符号,应该与玉礼器、彩陶礼器一样,亦走着沟通天地的文化功能道路,是用以人神交通、人神交流。一器一个记号,极个别的绘出两个符号,是用以向天神诉求、企福,“重复出现的频率较高”,正是向天神的要求的“重复出现”。从人神交通、交流;从单字到复合词、句到“完整的文书”;从人神交通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文字成为社会交流,文化发展的工具,陶器符号刻写者为巫覡,巫覡为智者、圣者,为通天阶级,刻写符号正是巫者借这些符号与天神沟通,以求得到天神赐福。从神物过渡为、转型为、人间化,从各地区、各区域最后总汇到甲骨文、到汉字,这是一个漫长而不间断进行的过程,是中华文明史上最具有文明独特性的一个伟大创造。正又呈现出这些陶器符号伴随玉器、彩陶作为沟通天地的神物的独特特质,是作为人神交通的神器、法器出现的,这正是陶符文字特定的文化性质及其特定的文化功能。它还不是“文明三要素”的文字这个问题。而作为具备形音意的人类社会交流工具的文字应是在陶符文字基础上,逐渐转型后完成的。这里有一个从神本向人本的转化过程。

中华文明探源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这里只是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些理论观念以及新石器时代——玉器、彩陶(还有陶符)时代——文明时代文明的产生、文明产生的多样性、各区域文明王国及其族团的文明的独特道路及其文明特质等诸方面;有些问题提出来了,却尚少全面融合、整体理解(如彩陶文化),有的只是提出(如陶器符号),还有待作为专门性问题,深入研究。这只是一部探索性的小册子,参加文明探源的讨论并提出来以就教于方家。

写于读书斋

06.9.28

# 目 录

序	001
前 言	001
第 一 章 中华古史上有一个玉器时代	001
第 二 章 彩陶文化与文明起源	013
第 三 章 王权源于神权	041
第 四 章 巫覡·王者·文化人	051
第 五 章 三皇文化论	065
第 六 章 黄帝文化论	089
第 七 章 大汶口文化与太昊、少昊、颛顼王国	103
第 八 章 红山文化与颛顼、高辛王国	125
第 九 章 良渚文化与祝融九黎王国	143
第 十 章 陶寺文化与唐尧王国	161
第十一章 虞舜王国文明	185
第十二章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与三苗王国	197
结 语	215
附 录：	
从整合思维视角讨论文明探源问题的几点思考 (张碧波 喻权中)	217
后 记	229

## 第一章

# 中华古史上有一个玉器时代

在中华历史、中华文明史上是否有一个玉器时代,是有争论的,这些争论涉及中华历史结构、中华文明史起源、中华文明特征与模式等诸多理论认识问题与实际问题的,是需要认真思考与严肃对待的一个大问题。

2005年11月在河南郑州召开的“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从学科整合思维角度讨论文明起源问题,标志文明探源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新阶段。<sup>①</sup>重新认识中华历史的阶段、中华文明产生的诸要素以及中华文明起源诸特征等问题,更显得重要而紧迫。这是学界共同关心的事,是全民共同关心的事。为推动文明探源的深入发展,我们不揣鄙陋,拟提出几点思考,参加讨论,以期有助于问题的研究。

关于玉器时代问题,曾有多位学者论述过这个问题。如郭宝钧、张光直、孙守道、牟永抗、吴汝祚等先生,并指出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个月牙形地带诞生了以玉器为主要特征的早期国家。<sup>②</sup>确认中华古史上有一个玉器时代,并因之确认玉器时代乃中华文明起源的时代。但这些新探索、新观念、新成果并未得到普遍承认,究其原因,根本在于西方文明史理论例如:“历史阶段三段论”、“文明三要素论”等理论观念还在束缚人们的头脑。

世界文化史与世界文明史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上不可能是在一个统一的模式中

<sup>①</sup> 见《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9日和《中原文物》2006年第1期。

<sup>②</sup> 牟永抗、吴汝祚:《试论玉器时代——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标志》,转引自郭大顺《红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进行,而古老的东方中国走着自己的独特道路。

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区域性以及因地历史历史文化格局、区域文化的运动速度等原因条件所造成的文化与文明发展不平衡性,要求人们在文明探源中应从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与文明的发展实际出发,而不是硬性地遵循某一所谓“约定俗成”的模式。方可接触到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实际,方可对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有所认识。基于此:

### 1. 应突破历史阶段三段论的局限与束缚

所谓“历史阶段三段论”,即指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经历石器——青铜器——铁器三个阶段,这种“历史阶段三段论的约定俗成的划分还会延续”。<sup>①</sup>

这是把所谓的“历史阶段三段论”当作“约定俗成”的固定不变的必然的唯一模式。我们认为这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符合世界文明史的实际,更不符合古老中华的历史实际。

从世界文明史上看,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文明及其之前的奥尔梅卡文明、玛雅文明均是没有青铜器的文明。中华历史、中华文明史上有一个横跨 5 000 多年的玉器时代。

这说明,历史阶段三段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历史的统一标志、统一模式。应突破它的束缚,根据中华历史的实际,认真审察与探索并建构出符合中华历史、中华文明史实际的中华史体系、中华文明史体系。

### 2. 应突破文明三要素论的局限与束缚

所谓文明三要素即文明的产生需要具备城市、文字、金属冶炼这三个要素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

对这种文明起源观,国内学界早已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种文明观“明显地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是类标志物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很难适应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区域性;其二是它将文明看成是单项因素的凑合,形成所谓‘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这既难以对文明社会的出现作出结构特征性的说明,更

<sup>①</sup> 郭大顺:《红山文化》,文物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1 页。